



深化体制改革根本在于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重温邓小平《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 韩晓青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讲话，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篇文献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面对科技与经济发展亟待深度结合的现实挑战，发出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时代强音。文献科学总结了科技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规律，明确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当时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活力，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仍具有启示意义。

“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就掷地有声地重申并赋予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新的时代内涵。这不仅是对一个时期内被忽略的科学价值的拨乱反正，也是当时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论指引。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仅仅7年后，一幅更具说服力、更富感染力的景象呈现在世人面前。1979年至1984年，中国农业总产值以年均7.7%的速度增长，平均每年增产粮食171亿公斤。1984年粮食产量达4073亿公斤，人均393公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辉煌成就的背后，离不开农业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突破性进步。种植技术的革新、新型农业机械与设备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农业生产效率。1985年，邓小平指出：“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实践中认识到，科技是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传播知识、推广技术的科技人

员，在农民心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他们“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科学技术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能带来真金白银的现实力量。这一社会现实表明，科学技术的价值深深植根于亿万农民的生产实践和生活改善之中，已逐渐深入人心，真正进入了寻常百姓家。重视科学技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为当时正在酝酿和推进的科技体制改革营造了极其有利的社会氛围，民众对科技发展的期待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动力。

“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轫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实践。在巩固农村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改革重心逐步转向城市，从局部试点发展至全面铺开。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在市场竞争中激发创新动力，提高生产效率。在此背景下，科技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科技工作虽然为国家建设作出过贡献，但科技工作与经济发展相分离的问题一直存在，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982年，党中央就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此后也采取了一系列促进二者结合的举措，但体制性问题仍未待解决。1985年，邓小平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同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拨款制度、技术市场、研究机构与企业、部门及地区相分割的状况等进行改革，其基

本精神是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化，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邓小平指出：“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经济体制改革旨在打破传统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而科技体制改革则是要促使科研机构和人员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加顺畅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服务于经济建设。将两方面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有望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如改革科研机构的拨款制度，使其不再单纯依赖政府拨款，而是要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求推进科研项目，从而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真正实现解放生产力的目标。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科技体制改革，其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动力，是推动国家进步发展深厚而持久的力量。邓小平指出：“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要关注人才问题，一方面，要切实切实为知识分子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给予更多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心从事科研工作，使他们无后顾之忧。这绝非泛泛而谈，而是要求改革必须精准切入科技人才工作生活的痛点、堵点。科研工作具有高度的探索性、复杂性和连续性，需要研究者心无旁骛、长期投入。然而，在当时，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薪酬待遇与贡献不匹配等问题，常常如无形的枷锁，消耗着科研人员的宝贵精力与热情。另一方面，邓小平指出，“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并强调“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要“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

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片面僵

化的人才评价标准，建立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机制和灵活开放的用人机制。打破论资排辈，鼓励优秀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打破单位、地域、身份等限制，确保科技人才在机会获取、资源配置、成果认定、荣誉授予等各个环节享有公平的起点和过程，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同时，要大力营造宽松自由的科研氛围，鼓励科研创新，在科研项目申报、职称评定等环节，更加注重科研人员的实际能力和创新成果，保护科研人员的探索热情和创新锐气，允许在未知领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宽容科学研究中难以避免的失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形式主义负担，让科学家有更多时间潜心研究，从而充分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能力，不仅关乎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还直接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和民族复兴伟业。谁能在科技创新的浪潮中勇立潮头、抢占先机，谁就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当前，全社会对科学技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增进民生福祉的全方位、深层次作用，已形成了空前广泛和深刻的共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我们要以更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最优优先位置。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价值取向，真正让一切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凝聚起建设科技强国和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非常现实的针对性。就国内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各方面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极为繁重，亟须在顶层设计上明确各项任务完成的时间表和优先序，使中国式现代化有条不紊地推进。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全面深化、发展的不断转型升级，改革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日益增强，而这就对顶层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必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未雨绸缪，扎实做好顶层设计与工作，使顶层设计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更好地坚持问计于民在当前也具有非常现实的针对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我们这么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每个人出一份力就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每个人做成一件事、干好一件工作，党和国家事业就能向前推进一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切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激发、调动最广大人民的智慧与力量，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攻克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不断夺取党和国家事业新胜利。

新的征程上，顶层设计要强化优化，问计于民要更好坚持。在将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结合来编制五年规划方面，我们党和国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成熟、稳定、有效的制度机制并且充分显示了其优势。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对于“十五五”规划的科学制定充满信心。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大棋局》是美国著名战略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代表作，自1997年问世以来，一直被奉为地缘政治领域的经典著作，该书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推出。布热津斯基曾先后任肯尼迪、约翰逊的外交和科学顾问以及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因而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论点也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观察家持续讨论的热点。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再看《大棋局》，不免读出其中局限性，给我们留下深刻思考。

时值后冷战时代初期，“美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全球战略来维持其在全球的特殊地位”是美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书中，布热津斯基为美国提出了大胆的地缘战略设想。他将欧亚大陆视为一个从里斯本延伸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巨大棋盘”，认为这是影响美国地位的中心区域，“是既决定世界今后的稳定与繁荣，又决定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而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的地缘政治目标是避免出现能够在欧亚大陆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对美国进行挑战的竞争者。在欧亚大陆的“棋局”中，布热津斯基区分了两类重要的国家，一类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力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致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地缘政治“棋手国家”，包括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另一类则是地缘政治“支轴国家”，这类国家的特征是地处敏感的地理区位并且潜在的“脆弱状态”可能对“棋手国家”造成影响，包括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和伊朗等国。布热津斯基认为，确定具有活力和能力引起地缘政治变化的国家，明确它们的对外政策目标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是美国制定具体政策的重要参考。进而，为系统分析欧亚大陆，布热津斯基划分了欧亚大陆的四个战略区域，即欧洲、俄罗斯、中亚—中东以及东亚。每个区域对美意义不同，也对应不同的战略。作为“民主桥头堡”的西欧，布热津斯基认为西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国的保护地，法德两国对欧洲的不同理解导致其对欧洲一体化的理想与路径设计存在差异，美国的西欧政策核心是建设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对于欧亚大陆的俄罗斯而言，布热津斯基预计，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前景会使俄罗斯在地缘、资源与历史叙事上陷入困境。对于欧亚大陆的巴尔干中亚—中东地区，布热津斯基认为土耳其和伊朗争霸可能带来动荡，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美国实行“有效”的欧亚大陆政策，还需要一只远东的锚，在东亚地区，布热津斯基认为，以“外部僵硬而仅有相对较小的灵活性”为特征的大国关系的“亚稳定”状态是东亚地缘政治的核心特征，东亚在经济上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布热津斯基警告美国会面临享乐主义蔓延、价值观衰落、社会分裂等内部挑战。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国会山事件、民粹主义盛行等，都体现了这些内部脆弱性正在侵蚀美国霸权的根基。

书中对欧洲安全与中国发展等进行了错误评估。在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等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之际，再看布热津斯基只视中国为“地区性大国”的判断未免狭隘偏颇。站在今日，我们也能很清楚地看出《大棋局》一书的这些局限性。书中充斥着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体现在布热津斯基始终是以美国作为“仲裁者”的身份看待和“规划”欧亚大陆，这本质上是美国霸权心态的体现。布热津斯基武断地认为中国、俄罗斯、欧盟都有称霸地区或向美国挑战的野心，并由此精心设计了一个欧亚大陆上主要行动者相互制约的体系，这仍然是19世纪帝国主义式的均势思维的延续，并无助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当前，随着全球南方国家作用显著上升，全球范围的权力转移持续提速，西方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日趋瓦解，国际格局加速向多极化转变。加之，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已大大超出了布热津斯基当年的预期，各国之间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密切联系塑

□ 王栋

读《大棋局》的反思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审视『大棋局』



▲ 《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造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相互依赖的世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影响，使地缘竞争难以概括当前国家间关系的全貌。

布热津斯基于2017年逝世，但布热津斯基的著作还在提醒我们：地缘政治永远是大国战略的必修课，但真正持久的领导力更源于对全球共同福祉的担当和责任感。在21世纪多元的世界中，包容性多边主义和新型安全观或许才是破解“大棋局”困境的终极智慧。这本书既是一部战略之作，也是一面历史镜象，其思想性与局限性都值得我们深思。新时代如何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幻交织的世界增添稳定性和正能量，更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探索和努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



（上接1版）广泛、多层次的问计于民使人民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民族一分子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由此可见，有效的政治参与对于人民力量的凝聚发挥着重要的催化作用。对于顶层设计而言，其有效落实同样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大力支持与不懈奋斗。对于贡献了自己智慧的顶层设计，人民群众自然有能动性去积极落实，对于能够有效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顶层设计，人民群众自然有积极性认真践行。概而言之，脱离了人民群众，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的统一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深刻理解列宁所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也可以深刻感知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我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是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重要保障

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注重经济计划。尽管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也对经济发展实施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计划调节，但其广度和力度无法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相比。现在来看，尽管我国最初几个五年国民经计划具有非常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在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上有所局限，但其实施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推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防科技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决策机

制日益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大政方针的顶层设计在听民声、汇民智、聚民意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与优化。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本身就体现了加强顶层设计与坚持问计于民的有机统一。邓小平带领我们深入探索如何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说明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有原则、步骤、方向，亦即有明确顶层设计的。同时，邓小平特别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他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在此，所谓“概括”“提倡”实际就是将民众智慧纳入顶层设计之意。顶层设计顺应了历史规律，既反映了人民意愿，又吸纳了人民智慧，自然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与支持。

从“六五”计划开始，计划的制定注重与问计于民有机结合，并基于民意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强调人民生活的改善、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目标要求，五年计划也由“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从“十一一”开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定位更加科学，更加准确地体现了顶层设计的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为进一步完善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提高规划编制过程的社会参与度与透明度，2005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颁布，提出要建立

规划编制的社会参与和论证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门户网站开辟了建言献策专栏，发布了电子信箱和信件邮寄地址，公开征集民众意见，同时成立了规划专家委员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五年规划的编制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结合起来，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规划编制中来。一方面，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中，基于对规律认识的深化，顶层设计进一步科学化，作用进一步增强，战略意义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不断健全完善使得问计于民更为便利、更有深度、更具效果。在这一过程中，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的结合愈益紧密，统一愈益富有成效。

“两个大局”背景下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

历经14个五年规划（计划），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非常明确：到2035年，用2个五年规划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再用3个五年规划期，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则是当前最为紧迫、奠定基础的任务。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思路举措。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十五五”规划的高质量制定对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的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顶层设计的强化与优化有着